第36卷 第11期
2010年11月

财经研究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Vol. 36 No.11
Nov.2010

集聚经济与企业区位选择

——基于中国地级区域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刘修岩[1],张学良[2]

(1.东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6;2.上海财经大学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空间数据中心,上海 200434)

摘　要:文章使用2004—2007年间中国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对集聚经济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为了分析和比较集聚经济的不同类型对企业区位选择影响的相对作用方向和程度,文章构建了地区产业专业化、地区产业多样性和地区市场潜能等指标。同时,文章采用了泊松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有效解决了被解释变量取值为0的个数较多这一计数数据特征所带来的实证困难。研究发现,地区的产业专业化、产业多样性和市场潜能等变量都对该地区期望进入的企业数量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从而证实了企业区位选择中集聚经济效应的显著存在性。

关键词:集聚经济;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市场潜能;企业区位选择

中图分类号:F061.5;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0)11-0083-10

一、引　言

新生企业的进入是地区生产率和就业机会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新生企业可以通过带来新思想、新产品和新技术手段,或者提高本地市场竞争程度等途径促进地区生产率提高和就业增长。因此,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对地方政府制定吸引新企业进入、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区域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长期以来,囿于数据的限制,基于中国数据的相关经验研究明显不足。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弥补国内这方面研究的不足,试图从集聚经济的视角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提供一个基于发展中国家数据的实证检验,同时为中国各地区如何创造有利于吸引新企业进入的区位条件提供经验依据。

本文使用2004—2007年中国地级区域近120万个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对集聚经济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

收稿日期:2010-08-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0CJL04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0803030);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0SJD790025)

作者简介:刘修岩(1979—),男,山东济宁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张学良(1978—),男,安徽安庆人,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空间数据中心助理研究员。

分析。在研究中,考虑到被解释变量为计数数据且取值为 0 的个数较多这一特征,我们采用了非线性的泊松回归模型进行了估计。研究发现,地区的产业专业化、产业多样性和市场潜能等都对该地区期望进入的企业数量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本文的探索之处为:(1)与国内现有文献仅限于对外商投资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不同,本文是基于一般企业区位选择的分析;(2)采用中国地级区域层面的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数据构建了地区产业专业化、地区产业多样性和市场潜能等指标,综合考虑了集聚经济的不同类型。

二、文献综述

关于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传统的区位理论强调了地区的自然优势,如市场位置(图能,1826)、地方化的技术知识(李嘉图,1817)和要素禀赋(Ohlin,1933)等,以及地方政府的区域政策,如政府的补贴、税收政策(Keeble 和 Walker,1994)等外生因素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但缺少对集聚经济因素的系统分析。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基于集聚经济的视角考察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事实上,早在 19 世纪末,Marshall(1890)就分析了集聚外部性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他指出,企业定位于同类企业较为集中的区位可以获得知识外溢、劳动力蓄水池和中间投入共享等外部性收益,这一外部性被称为 Marshall 外部性(或地方化经济)。与 Marshall(1890)的观点不同,Jacobs(1969)则认为,技术外溢更可能发生在多样性产业之间,因此企业更能从一个地区的多样性产业结构中获得外部性收益,从而地区的产业多样性会吸引新企业的进入,这一外部性通常被称为 Jacobs 外部性(或城市化经济)。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 Krugman 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通过建立一系列的一般均衡模型证明产业集聚所带来的货币外部性也是决定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Krugman,1991;Fujita 等,1999)。如 Krugman(1991)模型表明,在规模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的交互作用下,制造业企业倾向于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

最近的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集聚经济在企业区位选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Ellison 和 Glaeser(1999)使用美国各州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产业集聚的技术外溢效应是吸引企业定位的重要因素。Devereux 等(2003)基于英国 1986—1992 年的新生企业数据考察了新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企业倾向定位于同一产业企业较为集中的地区,同时地区的产业多样性也是吸引企业定位的重要因素。Monseny(2005)基于西班牙 1997—2000 年的数据,使用计数数据模型分析了集聚经济对地区新生企业数量的影响,也发现同一产业内的企业就业量(用来衡量地方化经济)和产业的多样性

(用来衡量城市化经济)对地区新生企业数量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Rocha(2008)基于法国1993—2002年的企业数据的研究也证实,在邮政编码区层次上集聚经济对企业区位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无论是地方化经济还是城市化经济对特定区域新企业的进入都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此外,还有许多文献考察了集聚经济在外商投资企业区位选择中所发挥的作用,多数研究证实集聚经济是吸引外商投资企业进入的重要因素(Deichmann,2003;Christian 和 Ioan,2007)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使用中国的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区位选择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集聚经济因素对中国外商投资区位选择起着重要的影响(贺灿飞、魏后凯,2001;王剑、徐康宁,2005;张俊妮、陈玉宇,2005)。

通过对文献的简单回顾,我们发现,关于集聚经济与企业区位选择关系的实证研究大多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数据进行的,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明显不足。同时,囿于数据的限制,国内的研究也仅限于对外商投资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分析,而缺少对一般企业区位选择的分析。因此,本文将基于中国2004—2007年间地级区域层面上的企业微观数据,使用较为前沿的计数数据模型分析方法,实证检验集聚经济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

三、研究模型设定

经济学理论揭示,在已知最优化投入要素选择时,一个企业将根据获得正利润的概率随机决定是否进入某个地区。而当企业选择在某地投资时,它将选择可行的投入水平向量 $x=(x_1,x_2,\cdots,x_j)$ 来最大化如下的利润函数:

$$\pi(x,y)=a(y)f(x)(1+\varepsilon)-c(x) \tag{1}$$

这里为简化函数,我们省略了时间、区域和行业部门下标,且产出品价格被标准化为1;x 为一个代表诸如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等投入水平的 j 行向量;y 是代表企业将要进入的地理区域行业特点的向量,$f(x)$是与每一个投入变量 x_j 正相关的生产函数。$c(x)$是一个单位投入要素成本的单调递增的线性函数。$a(y)$代表了集聚经济因子,它是该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等带来的集聚经济效应变量的正函数。ε 是反映企业异质性的一个随机变量。

如果对特定时期 t,企业进入地区 j 的概率是独立同分布的,那么该地区的新生企业数可以看作是一个泊松分布,即 $E_{jt}\sim \text{Poisson}(\alpha_{jt})$。其中,分布的均值和方差由密度参数 α 表示,且 α 随着区位、行业和时间的不同而变化。这意味着,在时期 t 进入地区 j 行业 i 的新建企业数 NB_{ijt} 可以通过带一个密度参数 α_{ijt} 的泊松分布来描述:

$$P(NB_{ijt})=e^{-\alpha_{ijt}}\alpha_{ijt}^{NB_{ijt}}/NB_{ijt}! \tag{2}$$

上述方程中的密度参数取决于地区和行业的一些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特

征。我们假定,对一个特定的地区、产业和时间,其密度参数和期望的新生企业数量由下式给定:

$$E(NB_{ijt} \mid x_{ijt}) = \alpha_{ijt} = \exp(\mu_j + y_{t-1} + k_i + \beta x_{ijt-1}) \quad (3)$$

其中:μ_j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特征,它代表忽略掉的能够影响企业盈利概率的一些地区特征变量,比如地区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等;y_{t-1} 为对所有地区而言都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如利率、原材料价格等;k_i 为存在于三位数行业部门间的异质性;x_{ijt} 为一系列随时间变化的本地产业特征,如地区产业专业化、地区产业多样化等集聚经济因素,这些特征可能会导致生产率的转换,从而对企业获得正利润的概率产生影响。由此我们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E(NB_{ijt}) = \mu_j + y_{t-1} + k_i + \beta_1 spe_{ijt-1} + \beta_2 div_{jt-1} + \beta_3 mp_{jt-1} + \beta_4 wage_{jt-1} + \beta_5 capitaldum_j + \beta_6 portdum_j + v_{ijt} \quad (4)$$

其中:i、j、t 分别代表产业、地区和年份;spe 为地区产业专业化变量;div 为地区产业多样性变量;mp 是地区市场潜能变量;wage 为地区工资水平。上述变量都取滞后一期进入方程,这可以避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带来的影响。capitaldum 和 portdum 分别为省会城市和港口城市的虚拟变量,β_i 为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v_{ijt} 为随机干扰项。

四、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统计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企业层面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采掘业、制造业和电力、煤气与水生产和供应业的全部国有和年销售收入 500 万人民币以上的非国有企业。根据该数据库提供的 2004－2007 年间近 120 万个工业企业数据,本文构建了地区产业专业化、地区产业多样性等指标。但在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时,我们仅选择了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共选取了 167 个三位数制造业行业的数据。另外,反映地区特征的数据则来自 2005－2008 年的《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剔除掉缺失的样本,本文共选取了 324 个地级区域的数据。同时,我们根据国家测绘局公布的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中的中国 1∶400 万地形数据库,使用 Arcview3.2 软件提取了各地级区域的经纬度,并计算了各地级区域之间的距离。[①]

(二)变量说明

本文的因变量为 NB_{ijt},表示第 j 个地区第 i 个行业在 t 期的新生企业数量。自变量包括本文主要关注的集聚经济因素和其他的一些控制变量,具体如下:

(1)地方化经济。借鉴 Glaeser 等(1992)和 Gao(2004)的方法,本文选用了一个衡量地区产业相对专业化水平的指标来衡量地方化经济,其计算公

式为:

$$spe_{ij}=s_{ij}/s_i \tag{5}$$

其中:s_{ij}和 s_i 分别表示 j 地区的第 i 个产业的从业人员数占该地区所有产业总从业人员数的份额和产业 i 的从业人员数在全国总从业人员数中所占的份额。该指标实际上是地区三位数行业的区位商,其取值越大则表明产业 i 在地区 j 所占优势越明显,即在此地的生产非常集中。

(2)城市化经济。本文沿用 Henderson 等(1995)与 Rosenthal 和 Strange(2003)的方法,采用地区的行业多样性指数来衡量城市化经济,即用赫芬达尔指数的倒数来表示,其具体计算公式为:

$$div_j=1/\sum_i s_{ij}^2 \tag{6}$$

其中:s_{ij}的含义同上。若 div_j 值越大则表明这个地区的产业多样性越强,即有相当多的不同产业分布在该地区。

(3)市场潜能。本文借鉴 Harris(1954)的度量方法,用一个地级区域邻近区域的市场购买力的加权平均和来衡量其市场潜能,其计算公式为:

$$mp_j=\sum_{r\neq j}Y_r/d_{rj}+Y_j/d_{jj} \tag{7}$$

其中:Y_j 是第 j 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d_{rj}是第 r 和第 j 地区间的距离,d_{jj}是各地区 j 的内部距离。[②] 该指标反映了一个地区市场规模的大小。

(4)地区工资水平。本文采用各地级区域的职工平均工资作为地区工资水平的代理变量。我们认为职工平均工资总体上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工资成本,同时这个变量部分地反映了各地区诸如高地价和昂贵的通勤等城市拥挤因素,其数据直接摘录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5)省会城市和港口城市虚拟变量。中国的省会城市(包括直辖市)一般是该省级区域政治和经济中心,我们引入省会城市虚拟变量来捕捉行政力量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而是否拥有港口则衡量了一个地区天然的交通条件,它可以对一个地区进入国外高收入市场的机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用这一变量控制一个地级区域进入国外市场的机会对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三)描述性统计

在我们的数据中,2005—2007 年三年间中国新生的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有33 331个,其中制造业企业共14 751个,占到了 44.26%。这些新生的制造业企业在行业和地区之间分布极不平衡。图 1 给出了三年中新生制造业企业的二位数行业分布状况。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食品加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新生企业数则排在前三位,分别达到了2 812个、2 508个和2 475个,而烟草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的新生企业数则排在后三位,分别为 80 个、191 个和 112 个。

表 1 给出了各主要解释变量的 2004—2006 年各年的均值和标准差。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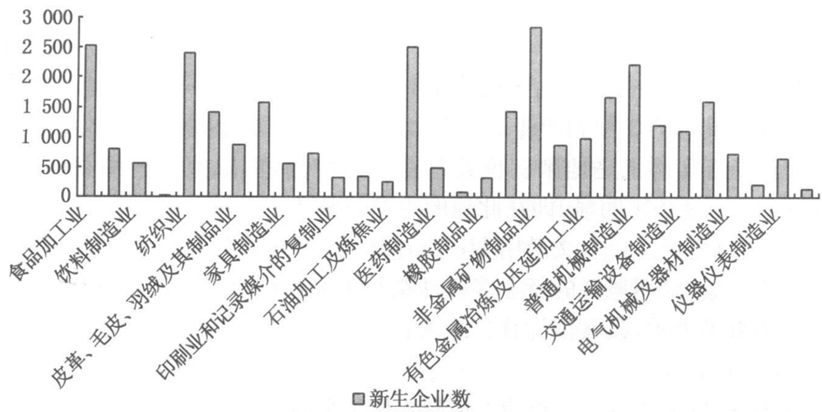

图1　2005—2007年二位数制造业行业新生企业数

1显示:中国各地级区域的市场潜能和工资水平都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各地级区域的多样性水平和行业专业化水平三年间则没有显著的变化趋势。

表1　各解释变量的均值与标准差

变　量	2004	2005	2006
div	16.31 (10.94)	16.19 (10.74)	16.33 (10.89)
spe	0.9271 (4.506)	0.9562 (7.009)	0.9764 (6.947)
mp	220.31 (84.91)	262.47 (102.34)	305.99 (119.35)
wage	1 369.04 (4 086.91)	15 617.13 (4 495.20)	17 767.07 (4 990.06)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5—2008)和《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2005—2008)。

五、实证分析

在计量分析中为避免只研究存在新建企业的地级区域集聚效应而产生的偏差,本研究包括了所有地级区域样本,而不论它们是否有新建立的三位数行业企业。因此,样本中被解释变量取值为0(没有新企业进入)的个数较多。为了处理被解释变量大量取0的情形,本文将考虑非线性的估计模型,其优势在于可以精确考虑数据的非负性和离散性。

在新生企业区位决策的实证研究中,条件Logit模型是最常用的模型。条件Logit模型存在一个重要的缺点:它难以计算存在多个替代变量(地点)的似然函数,这在研究的区域较为详细,从而地区个数较多的时候经常出现。

本文是基于中国地级区域层面的研究,包括了324个地区,因此难以使用条件Logit模型进行估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计数数据模型消除了替代变量的计算限制,从而在回归中可以使用更大的数据样本。因此,本文使用当前比较常用的计数数据模型——泊松分布模型进行估计。

我们对模型(4)进行了泊松分布的随机效应(RE)回归和固定效应(FE)回归,在回归中同时引入了时间和产业的非观测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见表2。其中,表2的第2列、第3列是对包含所有变量的模型进行的FE回归和RE回归,第4列、第5列是对仅包含集聚经济变量的模型进行的FE回归和RE回归。泊松回归中Hausman检验显示,包含所有变量的模型支持固定效应回归,而仅包含集聚经济变量的模型则支持随机效应回归。[③]进一步的观察我们还发现,四个回归中Wald检验和LR检验结果都高度显著,回归方程成立,而且集聚经济变量都显著且符合理论预期。

表2 泊松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NBijt			
解释变量	FE	RE	FE	RE
spe_{ijt-1}	0.036572*** (0.00072)	0.035645*** (0.00072)	0.03616*** (0.00071)	0.03526*** (0.00071)
div_{jt-1}	0.02413*** (0.00059)	0.02413*** (0.00059)	0.02866*** (0.00051)	0.02865*** (0.00051)
mp_{jt-1}	0.00571*** (0.00006)	0.00571*** (0.00006)	0.00522*** (0.00005)	0.00522*** (0.00006)
$wage_{jt-1}$	−0.000016*** (1.36e−06)	−0.000016*** (1.36e−06)		
$capitaldum_j$	0.23055*** (0.02100)	0.22993*** (0.02100)		
$portcitydum_j$	0.38836*** (0.02042)	0.38802*** (0.02043)		
产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产业数量	167	167	167	167
地区数量	324	324	324	324
Log likelihood	−78 043.554	−79 134.437	−78 251.444	−79 341.787
Wald test	21 893.87***	21 793.61***	22 035.23***	21 934.37***
企业数	162 324	162 324	162 324	162 324
Hausman test	Prob>chi2 = 0.0010		chi2(5)= −7.86	

注:(1)系数下括号中数值是标准差;(2)***、**、*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具体地,我们以表2的第2列来进行分析。首先,地区产业专业化变量的系数为0.0356,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地区产业专业化水平提高1个单位,会使该地区三位数行业的期望企业数量大约增加3.56%,从而表明

企业倾向于定位在其所属行业的企业较为集中的地区；地区产业多样性指数的系数为 0.0241，也在 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地区行业多样性水平提高 1 个单位，会使该地区三位数行业的期望企业数量大约增加 2.41％，表明地区的产业多样性也是吸引企业定位的重要因素。

其次，通过比较地区产业专业化和地区产业多样性对新生企业数量的回归系数，我们可以发现，产业专业化变量的系数大于产业多样性变量的系数，这意味着，从绝对量看，地方化经济比城市化经济对企业的区位选择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在一个方程中仅仅根据不同变量系数的大小来断定哪个解释变量更为重要并不可信，只有通过对解释变量的系数进行标准化才能把它们放在相同的地位上来比较。所以，我们通过计算得到地区产业专业化和地区产业多样性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 0.1981 和 0.2329。可以看出，与地方化经济相比，城市化经济对新生企业的进入有着更大的吸引力。

再次，市场潜能的系数也都显著为正，表明市场潜能较大的地区，由于拥有进入外部市场的良好条件，也是吸引新生企业进入的重要因素。而地区工资水平的系数则都显著为负，表明地区较低的工资成本也是吸引企业定位的重要因素。此外，省会城市虚拟变量和港口城市虚拟变量的系数也都显著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省会城市和港口城市对新企业的区位选择也有着重要的吸引力，这也证实了我们前面的预期。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使用 2004－2007 年中国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对集聚经济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区的产业专业化、行业多样性和市场潜能对期望进入的企业数量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而且与城市化经济相比，地方化经济对地区新生企业的期望数量有着更大的影响。同时，市场潜能的系数也都显著为正，而地区工资水平的系数则都显著为负。此外，省会城市虚拟变量和港口城市虚拟变量的系数也都显著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省会城市和港口城市对新企业的区位选择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的研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基于发展中国家数据的实证支持，同时也为中国地区新生企业生产率的差异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的解释。由此，本文引出的政策含义是，地方政府在制定吸引新企业进入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时应因势利导，充分考虑集聚经济因素，一方面充分发挥本地区的传统特色，促进具有地区特色的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提升地区的产业专业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加强本地区与外部区域的贸易联系、经济交流与合作，提升本地区的城市竞争力，大力改善本地区进入外部市场的条件，提高本地区的市场潜能，从而吸引新生企业向本地区集聚。

注释:

①鉴于数据量较大,为分析方便,本文采用各地级区域行政中心所在地之间的欧式直线距离来表示各地级区域之间的空间直线距离。

②其计算公式为 $d_{jj}=0.66\sqrt{area_j/\pi}$,式中 area 为各地级区域辖区内的土地面积,这些数据同样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③若 Hausman 检验中,卡方值较大(P 值小于 0.1)则拒绝 FE 回归与 RE 回归没有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从而支持固定效应模型;而若 Hausman 检验的卡方值为负,则不能拒绝原假设,也就是接受随机效应模型。事实上,此时随机效应回归结果和混合效应回归结果在回归系数上并没有差异,只是在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微弱差异,因此,FE 回归结果和 RE 回归结果没有明显差别。

参考文献:

[1]贺灿飞,魏后凯.信息成本、集聚经济与中国外商投资区位[J].中国工业经济,2001,(9):38－45.

[2]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税赋原理[M].(中译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3]图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王剑,徐康宁.FDI 区位选择、产业聚集与产业异质——以江苏为例的研究[J].经济科学,2005,(4):52－64.

[5]张俊妮,陈玉宇.产业集聚,所有制结构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区位选择[D].经济发展论坛工作论文,FED Working Papers Series,No.FC20050036,2005.

[6]Christian H A L,V Ioan.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Empirical evidence from Romania[R].MPRA Paper No.5137,2007.

[7]Deichmann J,S Karidis,S Sayek.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urkey:Regional determinants[J].Applied Economics,2003,35(16):1767－1778.

[8]Devereux M P,R Griffith,H Simpson.Agglomeration,regional grants and firm location [R].The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WP04/06,2003.

[9]Ellison G,E Glaeser.The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y:Does natural advantage explain agglomeration?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89(2):311－316.

[10]Fujita M,P R Krugman,A J 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Cambridge,Mass achusetts:MIT Press,1999.

[11]Gao Ting.Regional industrial growth: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es[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004,34(1):101－124.

[12]Glaser E L,H D Kallal,J A Scheinkman,A Shleiffer.Growth in citi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100(6):1126－1152.

[13]Harris C.The market as a factor in the localization of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54,64:315－348.

[14]Henderson J V,A Kuncoro,M Turner.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iti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5,103(5):1067－1085.

[15]Jacobs J.The economy of cities[M].New York:Random House,1969.

[16]Keeble D,S Walker.New firms,small firms and dead firms:Spatial patterns and deter-

minants in the United Kingdom[J].Journal Regional Studies,1994,28(4):411－427.
[17]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3):483－499.
[18]Marshall A.Principles of economics[M].London:MacMillan,1920.
[19]Ohlin B.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3.
[20]Otsuka A.Determinants of new firm formation in Japan:A comparison of th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sectors[J].Economics Bulletin,2008,18(5):1－7.
[21]Rocha N.Firm location determinants:Empirical evidence for france[R].HEID Working Paper No.08/2008,2008.

Agglomeration Economy and Firm Location Choice: Evidence from Prefectural Data of Firms in China

LIU Xiu-yan[1],ZHANG Xue-liang[2]

(1.*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0096,*China*;2.*Economic Space Data Center of Changjiang Delta*,*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4,*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all state-owned and non-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from 2004 to 2007,the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effect of agglomeration economy o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a new firm.To measu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y on firm location choice,it constructs such indexes as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regional industry diversity and market potential.At the same time,it applies Poisson panel data models to solve the empirical difficulty caused by many explained variables with the value of zero.The result shows that,regional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industrial diversity and market potential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number of firms expecting the entry into the regions,which confirms the existenc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c effect in the firm location choice.

Key words: agglomeration economy; localization economy; urbanization economy; market potential; firm location choice

（责任编辑　许　柏）